

阿斯塔菲耶夫作品中的苏联风雨

于明清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89)

提 要: 阿斯塔菲耶夫是以描写战争和大自然见长的作家,但他也一直秉承着俄罗斯文学中社会道德探索的传统,从早期的新经济政策到解体前的社会动荡,前苏联的重大社会事件在他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从这个角度看,他也是位“天生的道德探索作家”。他认为每个家庭的完善是消解社会危机的根本方法。

关键词: 鱼王; 悲伤的侦探; 社会道德探索; 家庭

中图分类号: H106.4

文献标识码: A

20 世纪的苏联历史似乎在刻意提供一个社会生态演变的完整模板,人们目睹了苏联政权从建立、发展、到失衡和崩溃的整个进程:以十月革命这一改变人类历史命运而震惊全球,以给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永载史册,又以一次更大的爆炸——苏联解体震撼世界。阿斯塔菲耶夫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生命,有着俄罗斯作家传统的救国救世的热情,同时他还是一个充满人性关怀的人道主义者,他一直在试图用自己的创作来对 20 世纪俄罗斯社会生态变迁进行文学阐释。

1 阿斯塔菲耶夫——“天生的道德探索作家”

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一直秉承着俄罗斯文学对社会道德进行探索的传统,他曾被苏联文学界称为“天生的道德探索作家”。凭着艺术家独有的直觉,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苏联社会的危机。1987 年,阿斯塔菲耶夫为《悲伤的侦探》中文译本所作序言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世纪的任何一位艺术家,也没有在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如此不幸的环境、如此不幸的时代里生活与工作过,我们站在深渊的边缘,清晰实际地,而不是书卷式地体会到哈姆雷特所说的‘是存,还是亡?’”此时,他似乎预见到了处在存亡边缘的国家将要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动。在这部作品里,作家似乎首次将视线从诗意的山水转向喧嚣的城市。他对社会弊端的剖析,对人的批判使小说带有鲜明的政论色彩。人们习惯于将《悲伤的侦探》看成阿斯塔菲耶夫从描绘自然到剖析社会的转变,其实,他的作品一直保持着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只不过其中有些被他“大自然的歌手”的光环所掩盖;有些则因为历史原因未能让读者及时了解。这部中篇经常和《火灾》、《断头台》并称为最早针砭社会弊端的苏联小说,而阿斯塔菲耶夫其实行动得比拉斯普京和艾特玛托夫更早。在作家的早期作品里,即使在被认为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鱼王》中,也揭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阿斯塔菲耶夫在《鱼王》里对很多苏联早期的社会历史问题,比如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发表过见解。20 年代中期,苏联已经完全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变到“新经济政策”,不久后开始用重新组织居民点的办法来调整和变革土地关系。新居民点主要由贫农和中农组成,富农则被迁到远离居民点的贫瘠土地。显然,作家认为这种对土地关系、生产关系和社会关

系的“净化”是不适宜的。小说中写道：“不知是什么人认为有必要把好些叶尔博加钦的居民迁至图鲁汉斯克，又把好些图鲁汉斯克的居民迁往叶尔博加钦。”从叶尔博加钦出发的人坐木筏去图鲁汉斯克贩卖木材，本以为可以发财，但能够到达目的地的人很少，许多木筏都被急流卷到石滩上，撞得粉身碎骨。有个妇女曾在迁徙途中看见一个男人双手一字张开被钉在山崖上，“他身上赤条条的，汗毛特重，胡须随风飘动，张开了黑洞洞的大嘴，似乎在对天呼叫；手臂伸展开，好像不让人们再往前走，因为他居高临下，看得见那叫人丧命的河口。”这个横死的男人在警告世人，不要远离家园。阿斯塔菲耶夫有着强烈的家园意识，对故土的情感就好像《乱世佳人》里的思嘉丽对塔拉庄园一样，那是一种无法用理性和语言解释的依恋和执着。

1990年，《鱼王》出版时曾被书刊检查机关删掉的“诺里尔斯克人”一章，以另一名称——“心灵空虚”出版了。这个短篇原是作品的第3章，处于“一滴水珠”和“达姆卡”之间，讲述了一个“诺里尔斯克人”从“英雄”到“逃犯”的经历。从20年代末开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盛行。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遭暗杀事件后，苏联全国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运动，一直延续到1938年秋，先后受牵连的人在500万以上，其中40多万人被处决，成为苏联30年代国内政治生活中突出的大事。此时苏联文坛歌功颂德之作颇多，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圣朝无阙事”，而是作家敢怒不敢言。“诺里尔斯克人”讲述的是一件发生在1937年的故事，阿斯塔菲耶夫用一个普通人在这个混乱历史时期的悲惨遭遇，揭示了时代的悲剧，回忆了那段让人不堪回首的岁月。“诺里尔斯克人”最初是逃犯的代名词，这些所谓的“人民的敌人”被发配到冻土带上建设一个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城市——诺里尔斯克。主人公本是个勤奋的讲习班学员，应该和他的父辈一样享受平静的生活，但战争将他变成了军人。他所在部队执行任务时犯了“错误”，三个首脑被判处5年徒刑，主人公却因为表现出对红军的“不信任”而被判了10年。夏天，不堪凌虐的“诺里尔斯克人”开始逃亡，他拖着残腿，屡次逃跑，一心想走到“能伸张正义的地方”，但都被抓了回来，还加了刑期。这个冉阿让式的“逃犯”没有等到他要的正义，在矿场里开枪自杀了，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声音是一声“斯大林同志万岁”，和“一声撕裂般的、孤独的、没有回音的射击声”。（В. П. Астафьев 1990: 30）这个“罪人”、“逃犯”、“凶手”从没有伤害过谁，逃亡时处在饿死的边缘也没有抢孩子手中的面包，而是谦卑地向他乞求。他当过上校，得过勋章，为祖国的安危成了残废，为诺里尔斯克的现代化建设出过力，在受尽折磨跟屈辱后依然忠于祖国，忠于领袖。他唯一的过错就在于有自己的看法，没有成为一个“只会挥舞着军刀喊‘万岁’，却根本不会动脑子的人。”（В. П. Астафьев 1990: 17）作家始终用“逃犯”、“诺里尔斯克人”来称呼主人公，显然是想以他来代表一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像主人公这样的逃犯很多，他们在官方的悬赏和冻土带恶劣的自然气候之夹缝中苦苦求存，有些变成真正的强盗。阿斯塔菲耶夫不仅同情主人公这样的逃犯，对那些变成劫匪的“诺里尔斯克人”也没有苛责，而是将他们比做普加乔夫。

60年代中至70年代，苏联实行“新经济体制”和倡导“科技革命”，很多农民迁往城镇或者农场，一些代表着古老生活方式的村落日渐冷落，成为“没有前途的村庄”。农民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一概被当作过时的东西加以抛弃。农村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风俗、道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鲍加尼达村的鱼汤》里那个与世无争的小村落的消失，就是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

《鲍加尼达村的鱼汤》是短篇叙事集《鱼王》第2部的第1章，描绘了一个体坐落在极北地区冻土带上一个村落居民的淳朴、互助的生活。这里神奇的冻土带风光，人和自然毗邻而居的融洽气氛，人与人之间善意、友好的关系成了作家心目中的伊甸园。作品中最高尚的“自然人”阿基姆就生长在这里。村庄里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地产生，这和道家遵循的“道法自然”的原则十分相似。尽管鲍加尼达村的自然环境恶劣，但居民却生活得充实、惬意。

捕鱼队每天出去打鱼，归来时，河岸上总是守候着迫不及待的孩子们。村子里天天举行盛宴——喝鱼汤。鲍加尼达村的鱼汤绝不是一顿简单的晚餐，它是团结互助的象征，不仅带给孩子们温饱，还维护他们的尊严，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喝着鱼汤成长起来的孩子懂得尊重他人的劳动，舍得把身上最后一件长袍脱给别人。可是这一切结束得突然而干脆，原计划要通过整个极北地区的筑路工程停止了，鲍加尼达村于是十室九空。村民远走高飞，只留下卡西扬一家。鲍加尼达村的最后一个家庭终究逃不过分崩离析的命运，阿基姆从此无家可归。对于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变化，他不理解，不明白，并产生一种与之对立的情绪。他对航灯标换成自动的这件新事物就很反感，认为是那些“呆在中心地区的人”闲得没事干，想方设法“把人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弄得人不得安生”。无休无止的迁移并没有将阿基姆和大自然割裂开来，反而加深了他的依恋之情，尽管当上了汽车司机，他还常常通宵达旦地坐在叶尼塞河边的草地上凝望星空和河水，还常常梦见白色的群山和雄伟的原始森林。阿基姆能够始终保持善良纯真的本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

1980年，阿斯塔菲耶夫回到故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奥夫相卡村居住，其创作进入了另一个繁荣时期。1985年他的代表作之一《悲伤的侦探》问世。80年代初，苏联政权已经显出衰败的征兆，工业生产持续滑坡，农业增长率于1982年下降到1%，“九·五”、“十·五”均未完成。始于70年代中期的进攻性国际战略给国家带来沉重负担，1979年12月，出兵入侵阿富汗数年，使危机中的政权雪上加霜。1982年起，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病故，然后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推行“改革”。这在苏联和全世界都引起注目，也带来了苏联时局的混乱。在这一政治动荡时期里，一向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的作家们苦苦地寻找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几部堪称当代文学经典的作品相继问世，并因其强烈的批判性引起轰动，这就是艾特马托夫的《断头台》、拉斯普京的《火灾》和阿斯塔菲耶夫的《悲伤的侦探》。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进行批判和揭露，艾特马托夫的小说触及了苏联当时一直讳莫如深的贩毒现象；拉斯普京用一场火灾表现出人们各种复杂的心态和缺点；而《悲伤的侦探》则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敏锐地捕捉了苏联社会80年代初期的混乱，表现了作家对濒临崩溃的社会生态的深深的忧思，甚至借用《钦差大臣》的情节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抨击。

尽管这段时间阿斯塔菲耶夫避居偏远故乡，但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桃花源。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州各个村镇的人都来求他相助，他的老家——奥夫相卡村几乎成了州里的“麦加”圣地，连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大人物都来拜访过。但他写这部小说并非不堪其扰，而是出于对苏联社会混乱现实的忧虑。小说描写苏联和平时期的普通生活，用一个充满悲剧意识的侦探，一个因为伤残而退职的警察的叙述，来反映现实生活，揭露了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和犯罪行为，批判了精神上的退化和道德上的堕落现象。作品一出版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因为作者所持的立场具有此前多年来文学上罕见的主动性和尖锐性，展示了苏联日常生活的种种丑陋图景：盲目的军备竞赛、贪污腐败、阿谀成风、酗酒、纵欲、犯罪以及道德和情感的匮乏。在社会经济改革正式宣布之前，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确立公开性原则之前，这样的言论无疑具有震撼力量。

阿斯塔菲耶夫是一位终身的外省作家，他青睐乡村的恬静，厌恶城市的喧嚣，因此他很少以城市为题材进行创作，《悲伤的侦探》却是个例外。该书的主人公，民警索什宁在同犯罪行为的斗争中发现自己的努力完全无效。主人公以及作者都为社会整体道德的崩溃感到恐惧和忧虑，这种道德崩溃最终将导致人类残忍、无情的犯罪。在“悲伤的侦探”眼中，无序的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长期的军备竞赛让民族工业岌岌可危、经济建设中弄虚作假、教育上存在重大失误、人们对事物普遍麻木不仁、家庭不稳定、道德水平下降、犯罪率上升、知识分子的市侩倾向高涨等严重问题，无不说明城市社会生态的失衡。

阿斯塔菲耶夫没有让主人公索什宁与其他人泾渭分明，高高在上，而是让他们融为一体。

他展示的是普通人因为周围生活的缺陷所承受的痛苦。在小说里，作家就俄罗斯灵魂、俄罗斯性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小说描写的细节背后隐藏着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样与人沟通，怎么样帮助人们？“悲伤的侦探”这个题目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主人公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人物。他天性善良，随时准备帮助任何有需要的人，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因此他选择了警察这个职业。但他并不是按照职责来执行任务，而是听从自己善心的召唤。他个人的力量渺小，经常为自己无能为力的挫败感而沮丧。更可悲的是，他正当盛年就因伤停职。侦探习惯于将人分成好人和罪人，在失去判定人是否有罪的资格后，显得非常茫然。另一方面，他眼中那个混乱和颓废的世界也让人不能不感到悲哀。

《悲伤的侦探》以索什宁的目光和思考剖析了解体前夕苏联社会的各个角落，首先，政府的腐败之风遍及各地，从中央决策层到普通营业科的职员都不例外。上级官员到各地巡视，地方官员阿谀奉承。小说里欢送首都来的“大人”那一幕，是作家对官僚作风最犀利的批判，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里那可笑的一幕居然在维伊斯克市可悲地重现，大小官员齐聚车站，欢送来自首都的“大人”。维伊斯克市就像果戈理笔下那偏远的外省，这位“大人”也和赫列斯达科夫一样并不货真价实，“从衣着和很不庄重的瘪瘪的肚子可以看出，这个‘大人’并不太大”。送行画面里出现了现代版本的多布钦斯基和比勃钦斯基：埃季克和瓦季克。这两个技术官吏都是工业学院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很年轻，可是已满口假牙，都穿着“国外缝制的现代的节日盛装”，打着“从阿拉伯或波斯一带搞来的”“高雅的领带”，“手指上戴着有字母的戒指”，“衣服上饰有金扣子”。这一身装束暴露了他们的奢靡、虚荣和崇洋媚外的本性。当首都来的高级官员从车上跌下来时，当代的多布钦斯基和比勃钦斯基“熟练地托着‘大人’滚圆的屁股”，“大人”已经醉了，总是要往下倒，还几次坠了下来，每次倒下都“引起了多布钦斯基和比勃钦斯基的阵阵兴奋。”作家用了几个巧妙的人物置换就轻易地把《钦差大臣》这部“最完备的俄国官吏病理解剖学教程”用到批判维伊斯克市的大小官员上，又用几句简单的评论营造出“一叶知秋”的戏剧效果，将批判的范围扩展到整个苏联社会。

沃洛佳·戈利亚切夫是维伊斯克市最特别的官员，本是个农村孩子，由当铁路分局局长的舅舅领养。他曾经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受到过格拉尼娅大婶的耳濡目染，一直品学兼优，后来负责指挥维伊斯克市最大的建筑公司。他厌恶腐化的习气，但还是对维伊斯克市的习惯风气低了头，当人们叫他到跟前去时，他也和“大人”在车厢旁同饮了一杯。因为他明白，只要官员满意，原计划拨给其他城市的很多资源就会分配给维伊斯克市，他们就能超额完成任务，而且能为国家“节约”很多资源。不管这些资源本来应该分配到哪里，但所有的领导都将清楚地知道这些国家财富是维伊斯克市省下来的，至于真正应该得到资源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完成计划，这就和维伊斯克市毫不相关。他的心里充满矛盾，一面唾弃，“这种现象什么时候能了结呢？”一面又为报纸上对维伊斯克民用建筑公司节约了大量资源的报道而沾沾自喜。

90年代，俄罗斯人爱走极端的民族性格再次得到充分显现。苏联解体后，社会陷入更混乱的状态，西方化和民族性的冲突愈演愈烈，阿斯塔菲耶夫的《快乐的士兵》描述了此时苏联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小说写作过程长达10年，从1987年开始，到1997年才和读者见面。这部自传性作品共有两部分：“士兵疗伤”和“士兵娶妻”。主人公是阿斯塔菲耶夫的化身，借助于一个残疾士兵离开前线，重新回到平静生活的故事，作家回顾了自己充满了矛盾的年轻时代：去前线和离开前线、战争与和平、甜蜜和冲突、诞生与死亡。小说的忏悔中夹杂着诅咒，哭泣里交织着嘲弄，用脏话来诠释神圣，用政论来进行祈祷，以此来表现这个时期的混乱。巴辛斯基认为，小说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作家通过这个身体严重受损，但依然保持完整精神世界的士兵，描写的绝不是“人民的身体”，是“民族的精神”。作家的名字维克多·彼德洛维奇被分开来用，表达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维克多代表胜利者，彼德洛维奇则是个可笑的普通俄罗斯男人，一个酒鬼，爱唠叨，他时而善良，时而又是个恶毒的失败主

义者。主人公曾经是维克多，现在却成了彼德洛维奇，但他随时有机会再变成维克多，因为那个胜利者只是藏起来了，并没有离开。这似乎是 20 世纪俄罗斯人心灵演变的一种写照，作家满怀着对民族精神复兴的希望。

2 阿斯塔菲耶夫解决社会生态问题的方案——消解现代家庭问题

阿斯塔菲耶夫把家庭问题看作是一个“同死亡一样不可理解，无法解决”的天大的谜，为了猜透这个谜，人们已经花费了数千年的时光。家庭这个谜关乎世界存亡，作家曾经说过：“如果在一个王朝、一个社会、一个帝国中，家庭开始遭到了破坏，他和她淫荡起来，互相找不到对方，那么这个王朝、这个社会、这个帝国也就垮台了。”家庭的不和睦是社会斗争的原因，“不能创造家庭或者破坏了她的基础的王朝、社会、帝国总是要夸耀所取得的进步，炫耀自己的武力。在家庭瓦解了的王朝、帝国、社会中，和谐也在瓦解，恶开始压倒善，大地也会裂开大缝，吞没那些没有丝毫理由自称为人的败类。”

显然，作家将家庭和谐看作是拯救社会的基础。婚姻和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它受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又影响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风尚的发展。恩格斯早在 1884 年就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人种繁衍的基础就是婚姻与家庭。家庭的悲剧使阿斯塔菲耶夫的童年充满坎坷。7 岁时，他母亲淹死在叶尼塞河里，父亲再娶，他与继母关系不好。他在中篇《隘口》里便寄托了对母亲的思念。许多年后，当他已经成了著名作家，他依然无法忘记母亲早丧的痛苦。他说过，他对命运只有一个请求，就是把母亲留给自己。阿斯塔菲耶夫一直重视家庭问题，甚至将它视为解决社会生态问题的关键，也许正是因为他痛苦的童年经历。

阿斯塔菲耶夫认为，要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应当“从自己做起。永远应当从自己做起，然后再解决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问题”。（Л. А. Костылева 1998: 249）面对社会生活的惯性，索什宁意识到个人的渺小无力，并充满悲哀之情。他最终和《火灾》中的叶戈罗夫选择了相同的道路：要改变外界的混乱，首先要克服内心的混乱。索什宁最终为自己找到了出路，就是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庭做起，并以此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突破口。社会由家庭组成，每个家庭像是一个细胞。健康的细胞正常新陈代谢，在消亡的同时也衍生出新生细胞，才能让肌体生生不息。索什宁决定把自己的生活好好安排一番，弄清生活的意义。他将学习如何理解、关心他人，而且不是像过去那样，用“刑警”的眼光审视别人。他听从了嘟嘀什哈大妈简单而真实的人生哲理，决定和妻子修好。夫妻之间“共同克服困难，应当相互容忍对方的缺点”。这个世界上最初的人类是亚当和夏娃，每个人都在寻找另一半，好让自己的生命变得丰盈、完整。亚当和夏娃的再度结合将让这个断裂的时代重新连贯起来。《圣经》说：“男人应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应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对妻子应该尽他的本分，妻子对丈夫也应当这样。”（《圣经·哥林多前书》第 7 章第 1 节）只要亚当找到自己的夏娃，两个人相处得和谐、融洽，那么，他们的家就是伊甸园。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苏联的家庭问题已经很严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1978 年 10 月 11 日，列宁格勒心理学家 Г. 亚历山大洛夫在《文学报》发表的《当家庭患病时，应该给它治疗》的文章中指出，家庭的不稳和破裂，“这显然不是个别现象，它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是苏联 20 世纪中的家庭危机。”（棕榈叶 1981: 22）阿斯塔菲耶夫曾经写过一篇叫做《现代新郎》的小短文，通篇不足百字：“在婚礼上，人们对新婚夫妇祝贺，说：‘愿你们和谐幸福！共同分享快乐和忧愁！’‘不娶老婆，我的快乐也够多的哩！’现代新郎这样回答说。”古老的圣训告诉人们，“无论怎样，你们各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圣经·新约·以弗所书》第 5 章第 28 节）但是，现代新郎却只会爱自己。

阿斯塔菲耶夫用《圣经》的训诫来解决索什宁的家庭问题。他认为，宗教对调整人的道德观念、家庭观念，建立平和的心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宗教具有道德能动性，是给世界注入爱的有益力量。它会把善灌输到人的心灵里去，从而灌输到人们之间的直接私人关系之中，也就会惠及自然界。索什宁和列尔卡的婚姻具有典型的意义，小说开始时，他们正在分居，这是“现在时兴的做法”。“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不要单注重外裹的妆饰，就如卷头发、戴金饰、穿华丽衣服；却要在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作不能毁坏的妆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这句话似乎是对列尔卡的告诫。哈伊沃夫斯克的男人们把列尔卡叫做“舞女”，因为她很爱打扮，穿着时尚，走路的时候总是扭动着所有能活动的部位。索什宁爱上的是卸去了所有装饰的列尔卡，当时她正无忧无虑地酣睡着，唯一的装饰就是唇间甜美的微笑，那样子根本不像她在大庭广众之下所表现的一样。尽管列尔卡是个被宠坏的姑娘，不知道如何照料丈夫和孩子，但她深爱自己的家庭。她曾一度与索什宁分居，却在丈夫重伤得几乎残废时回到他身边，全心全意照料他。列尔卡时髦的外表是一层伪装，她的内心实际上深情而矜持。她的问题在于不能全心全意地展现自己真实的一面，仍有所保留。

同样，索什宁也有自己的伪装，让他不能对妻子敞开心扉。“你们作丈夫的，也要合情合理的与妻子同住。你软弱，要尊敬她，因为她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的。”（《圣经·新约·彼德前书》第4—5节）这句话是对亚当们说的。索什宁和妻子分开是为了一个衣柜，他拒绝让妻子将衣柜挪动30公分。作家将衣柜比做果戈理《死魂灵》中的梭巴凯维奇，一个非常固执、独断独行、咄咄逼人的，看起来像头熊的庄园主。梭巴凯维奇和他庄园里的一切都高大、阴暗，给人以压迫感。这个古老的衣柜像是索什宁心中固守的男性威严，他希望能够保留自己作为男人、作为警察的威慑力及压迫感，坚决不许妻子触及。列尔卡走后，他在家“逍遥自在”、“为所欲为”，但巍然不动的“衣柜”无法阻断他对妻子的思念。一本书打动了他，虽然作家没有告诉我们书的名字，但这显然指的是修女玛丽亚娜·阿尔科福拉多所著的、享有盛誉的情书《葡萄牙书信集》。5封书信流露的柔情，彻底摧毁了索什宁心中固守的堡垒，让他知道爱情的宝贵。同爱情相比，他所谓的自由和尊严显得微不足道。“他的心里像有什么东西被挪动了地方，如同衣柜被般了出来”。索什宁想把抛弃了修女的人抓回她身边，“把他的鼻子往那女人温馨的膝头一推——珍惜她吧，轻佻的家伙，和她相比，世界上其余的一切只不过是尘土、垃圾、不值钱的东西……”他借用了法国人和修女来表达自己赶走妻子的懊恼，其真正要表达的是把自己抓到妻子身边，把自己的鼻子往妻子温馨的膝头一推。值得注意的是，索什宁是要把负心男人的鼻子往女人的膝头上推，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要知道，第一次见到列尔卡时，吸引他的就是后者温馨的膝头。“她的两个膝盖露出来。原来，那膝盖根本不是尖的，并没有挑衅性，而是滚圆、白净的。一个光斑像小猫似的，亲昵地在女客的双膝上跳动着。”他们的婚姻出现了裂痕，索什宁受伤又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从昏迷中醒来，看到妻子坐在病房里，这时，也是关于那个温馨的膝头的记忆唤醒了已经沉睡的爱情。他吃力地把手放在列尔卡的膝盖上，又“想起了这结实、滚圆的膝盖被阳光照耀时的情景，那是在那儿，在林业宿舍里的事，是很久以前的事，是上辈子、上个世纪的事。”

善恶美丑颠倒，好坏是非混淆，这种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风气败坏和人性的泯灭，严重干扰了索什宁信守不疑的人生原则。他既不满意世风的衰微，更不满意自己不得已的软弱与退让，于是内心的痛苦和迷惘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这便是我们在小说开始看到的主人公的心理和情绪。在故事的结尾，索什宁从达里的《俄罗斯民间谚语》里找到了答案，终于明白了“只应有结婚，不应该有离婚”，“妻子不是靴子，不能随便抛弃”。最后，他决定不再保留衣柜，把这口“棺材”劈掉当柴烧。他把柜子称为棺材，显然是想埋葬一个人的“男子汉”的生活。两个人的生活需要牺牲，不牺牲旧的东西，就不能建设和完善任何新的东西。索什宁要建设和完善的新东西就是家庭。至此，他终于不再对妻子有所保留，不再是那个到妻子家里求婚，心底深处却懊恼着即将失去自由，恨不得拔腿就

跑的“现代新郎”。“两根很粗的导管直接从妻子列尔卡那儿通向他，通向丈夫这里！他们是永久地联在一起的！”和夏娃复合后，枯竭的心中往事全都复活了，长期以来，一直压迫着他，令他窒息的悲伤烟消云散了。离开嘟嘟什哈大妈的墓地时，他心中的悲伤让他无力抬起头面对阳光，几个小时后，找到了出路的亚当怀着他许久不曾体验过的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在写字台旁坐下，心中既不烦躁，也不忧伤。索什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也就摆脱了困扰他良久的悲伤情绪。小说并没有告诉我们主人公从我做起的计划是否能够真正成功，但他那轻松、平稳的情绪与原来那种疲惫不堪的感觉和苦闷心情判若云泥，这个转变给人以启迪、希冀、信心和力量。有评论家曾说：“他（阿斯塔菲耶夫）的声音是悲伤的，但却不是悲观主义的，其中既有忧虑，也有希望。”（А. П. Ланшиков 1992: 125）的确，作家的希望不在于民警索什宁同罪犯的英勇搏斗，而在于普通人索什宁孜孜不倦的精神探求，在于他最终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 [1] Астафьев В. П. 1990 Не хватает сердца [A]//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C].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 [2] Ланшиков А. П. 1992 Виктор Астафьев[M].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 [3] Костылева Л. А. 1998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IX-XX веков [M]. М.: Омен.
- [4] 棕榈叶 1981 苏联文学中有关婚姻家庭问题的几部作品简介[J], 外国文学动态, 第9期。
- [5] 圣经·新约全书(新译本) [M], 香港: 中文圣经新译会第5版, 1979年。

Soviet Social Problems in Astafiev's Works

YU Ming-q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Astafiev was a writer who was famous for description of wars and nature, but also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social morals exploration in the Russian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y new economic policy to the social turbulence before disorganiz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many significant social events were reflected in his works. From this point, he was an “inborn moral exploring writer”. He believes that the problem would be solved by perfection of everyday family lives.

Key words: Czar Fish; Sad Detective; social morals exploration; family

收稿日期: 2008-10-26

作者简介: 于明清 (1976 -), 女, 黑龙江省牡丹江人,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责任编辑: 刘 锐]